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試評〈都市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以路邊洗車業爲例〉：台灣關於“非正式部門”研究的一些誤解

A Review of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s Street Car Washer an Informal Sector Washer"-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Informal Sector' in Taiwan

doi:10.6154/JBP.1987.3.008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3), 1987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3), 1987

作者/Author：吳永毅(Yung-I Wuo)

頁數/Page：179-19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7/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7.3.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試評〈都市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以路邊洗車業為例〉： 台灣關於「非正式部門」研究的一些誤解

吳永毅*

A REVIEW OF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S STREET CAR WASHER:
AN INFORMAL SECTOR VIEW"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INFORMAL SECTOR' IN TAIWAN

by
YUNG-I WUO*

摘 要

有關「非正式部門」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在台灣出現。本文以波提斯 (A. Portes) 所寫〈非正式部門〉之觀點為基礎，藉著評析陳小紅與周鳳之〈台北市路邊洗車業之研究：以非正式部門觀〉一文，指出非正式部門活動是相當異質與動態的，其特性應放在特定社會、經濟與歷史的脈絡中加以分析與考察。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informal sector" have appeared in Taiwan in the last few year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informal sector proposed by Portes, this article review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n informal sector in Taiwan and indicates that informal sector activities are very heterogeneous and dynamic. Their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analyzed and examined in the specific social,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民國76年6月10日收稿

* 柏克萊加州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所研究生

Manuscript received on June 10, 1987.

*Graduate Student,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一、前 言

最近台灣用「非正式部門」概念（以下簡稱IFS），進行的社會研究開始大量出現。就目前已收集到的資料來看，理論和文獻回顧以陳小紅的〈開發中國家都市「非正式部門」之研究〉（以下簡稱〈陳文〉）（1984）為主；實證研究已完成的有攤販及路邊洗車兩篇碩士論文，也都是陳小紅指導的。這篇短文的目的是評析陳小紅及周鳳合寫的〈台北市路邊洗車業之研究：以非正式部門觀〉（以下簡稱〈洗車〉），以它作為代表來討論陳小紅所領導的IFS研究的問題。

由於此文文獻回顧部分，其結構、分類和結論都和陳小紅1984年的論文非常相似，所以要分析〈洗車〉概念上的偏失，其實應當先評述陳文才對；然而〈陳文〉和〈洗車〉在理論上都有相同的盲點，為了和讀者建立討論的起點，在此特將波提斯（A. Portes）1983年的文章全文翻譯，附於本文後，因為：(1)波提斯的文章是從宏觀的歷史過程來闡述IFS的形成及其意義，可提供讀者一個清楚的理念架構；(2)它彌補了〈洗車〉所遺漏的歷史性詮釋的部分；(3)它簡短的回顧了〈洗車〉所提及的主要學派，並指出它們的缺點；(4)它有明確的社會意義，不是偽稱中性的「學術研究」而已。希望讀者能先讀過長於正文的附錄，如此在討論的過程中，較易掌握〈洗車〉所犯的概念上的錯誤。

波提斯此文發表於1983年，但其辯證之精簡和清晰，致今仍然有效。唯一可惜的是它著重於歷史結構的分析，無法顧及非正式部門的各種活動的特殊性、和相關的機制，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另外補充說明。

對於〈洗車〉一文，我們將分三部分討論：(一)理論問題；(二)預測及建議的問題；(三)IFS研究在台灣興起的社會意義。

二、〈洗車〉的各種問題：

(一)〈洗車〉的理論問題：

〈洗車〉一文在理論，和由理論支持的實證分析上，有下列七個主要的問題：

1. 概念上仍是「現代化理論」派的：

〈洗車〉全文把「就業」問題看成一自然現象，認為人必須就業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就業」是相當新的現象，農業社會裡大部分的人都是從事維生生產活動（即，自給自足、簡單商品交換），在資本主義工業化之後，原來佔多數的農民才被迫脫離維生的土地，變成一無所有，且必須受僱（「就業」）來賺取工資，以便購買消費品養活自己和家庭。

現階段台灣的整個社會已相當的資本主義化（包括農業部門的勞動人口中僱用勞動也佔相當高的比例），這種社會經驗使台灣，尤其台北的社會學家，特別容易接受被西方「自然化」以後的社會學理論，認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下的一些社會特性，就是人類共同的特性，是發展的自然趨勢，而把這些特性在空間和時間上都無限制地加以投射。〈洗車〉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就明顯地傾向維護「正規經濟」、「現代市容」和「電動洗車」，並歧視IFS（見p.p.1-2）。〈洗車〉把從業人員戴斗笠、蒙面巾、穿膠鞋的「奇異景觀」（p.2）當作是常規外的歷史殘跡，或是社會不正常的現象，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在意識形態上把已發展的部門當作是社會必然的規範，所以無法視IFS為發展過程（以波提斯的觀點來看就是無產化的過程）的一個表徵。

在研究像路邊洗車這種IFS活動時，必須要察覺到它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和結構的特性下被創造出來的現象，也表示台灣發展的現階段，是無法提供大部分的人像先進國家一樣的，以狹義的「就業」來維生，而必須在「正規經濟」外另闢蹊徑，也就是設法廣義的「就業」。而「就業」這個概念和事實，本身又有它時空下的特殊性，是需要被研究的對象，不應像〈陳文〉或〈洗車〉簡單的套用「就業／失業」的觀念來分析IFS。

2. 台灣現階段的發展沒有加以歷史定位：

〈洗車〉在文獻回顧時，零亂的提及了各種界定正式／非正式部門的方法，讀者可以發現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唯有一點可以確定，就是有正式部門才有非正式部門。波提斯論文的好處就在於他把眾多的FS／IFS界定納入一個較統一的架構評析。他認為沒有特定的活動，個體或企業在理論上是必然可以界定為IFS的，而必須把FS／IFS的關係放入歷史程序來考察，才會比較清楚。這個程序簡單地說就是：社會活動被制度化因此產生了正式部門，不被正式部門規定或有意規避規定的活動就是非正式部門。

就〈洗車〉文獻回顧所提及的，常被用來界定FS／IFS的準則是：工作是否受保障；企業的規模；生產關係（受僱／自僱、隱藏性受僱或無酬勞等）；工作狀態（固定／零工）；生產方式等等。若我們將其歸納整理，可發現FS／IFS過程至少涉及四個因素：

(1) 勞工的地位：勞工在合約關係和法權上的地位。

(2) 工作條件：工作場所內外的安全、衛生和區位的條件。

(3) 企業（生產單位）本身的組織及經營方式。

(4) 活動本身：有些活動很難以上述三者一般的標準來區分FS／IFS，例如黑社會和色情活動。

因為這過程是動態的，所以這四個因素在不同的社會、地區及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特性，我們只能暫時的界定它們，而無法建立一個理論上具普遍性的界定。因此當我們要藉用別人文獻裡的概念時，必須把它放在台灣現實社會加以重新檢證，可是〈洗車〉卻沒有這樣做。它沒有一處涉及這最基本的問題：現在台灣發展的歷史階段為何？什麼是台灣正式部門的特性？用四個基本元素來回答上列問題，就至少要考慮：

(1) 受僱者受到什麼保障？

在勞基法公佈（且真正被執行）前，台灣的勞工地位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制度化的保障。除了一部分公營和私營企業內部自行制度化了聘僱和解約的程序外，所有的受僱勞工都是IFS。

就福利而言，除軍公保、勞保所涵蓋的少數人口之外，其他勞工也都是IFS。

如果罷工是ILO所說的勞工應有的權益之一，那麼台灣的勞工全部都是IFS。

(2) 工作的條件如何？

台灣各種勞工法令執行甚為鬆弛，勞工傷殘率幾乎為世界第一，勞工的安全與衛生全無保障，都是IFS。

就廠外污染和公共安全而言，如果新的環保法令通過並被執行，台灣大部分的工廠就其目前造成公害來看，勢必在環保制度化後大量轉為地下化（IFS化）或倒閉。

台灣地下違章工廠達七萬餘家，與登記有案的工廠數幾乎相同（中央日報，1987），其中一大部分是都市計畫分區規定之違法。此法令之所以沒有嚴格執行，是因為社會的生產組織無法負擔工作／居住劃分嚴明的都市基礎建設，所以有意容忍這龐大的IFS的存在。

(3) 企業的組織和經營的形態如何？

當制度化的受僱關係（例如工資、福利、退休金）對資方說來成本過高或彈性不夠時，就會把生產組織轉向非正式化。例如整個營造業的發小包作業方式；客廳工廠的外包作業，保險業的推銷作業（或是台灣頗負盛名的安麗公司的直銷系統，基本上都是把固定工資改為計件式的支付方式），或是IBM等跨國公司，在台的國際轉包（OEM）行爲，都是爲了降低資方在固定生產組織上必要的支付，而有意使之非正式化的。

(4) 活動本身的狀態如何？

正式／非正式相互界定的程序不一定是循直線演變的，台灣色情行業的歷史就可看出FS／IFS的動態關聯：北投廢娼，使色情IFS化；最近又要開放特種營業登記、設立色情特區，是想把大量IFS活動再加以正式化。

又如黃金買賣正式化的過程中，銀樓的反應就充分的表明了IFS活動如何嚴重的受到FS的影響。

目前開放對外投資的措施，就是要把原來非正式的「資金外流」加以正式化（反諷的是此刻正好有所謂「熱錢」問題一即「資金內流」的非正式化），原來動搖國本的資金外流變成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之一；所以，沒有一必然的定義。

以上不厭其煩的列舉各因素可能的特性，是要說明IFS是被FS界定的，而FS的形成是一特定的歷史程序。在討論台灣的IFS之前，必須先說明目前FS的特性。

〈洗車〉沒有這項說明，是假設「非正式部門」有一普遍的特性，而讀者有此共識。其實這問題是從前一問題延伸出來的：即，它假設「正式部門」有一既定的規範，是不必分析的，是發展自然的趨勢。

3. 用活動單位的法權地位來區分FS／IFS：

〈洗車〉開宗明義，在第一章、第三節：研究範圍裡說：「本研究基於洗車業特性的考慮，採用是否有合法營業執照爲正式／非正式行業之分別。」

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區分法，因為它是靜態的、狹義的，且只從執法者的角度來看IFS。即使ILO或世界銀行也不會採取此單一的界定標準。如果說爲了方便而必須採此操作性的定義，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實證分析完之後，應有明確的修正和補充。〈洗車〉沒有此補充，顯然不是遺漏，而是理論上的失誤，它以爲：非正式＝非法營業。

舉例來說：修車店不領薪水的學徒（P.51），顯然是IFS的僱傭關係；電動洗車店如果僱用低薪、沒有合約、沒有勞保的工人，照〈洗車〉的定義，它仍然是「正式部門」。同理，按此定義，公營企業永遠是FS，它們大量僱用臨時人員、短期工人的非正式情況都不在考察範圍內了。又如王永慶的工廠（絕對有執照），在勞基法通過後，解聘工人，迫其改組爲合作社「承攬」工作項目來逃避〈勞基法〉（周薄通，1986）。在〈洗車〉對IFS的定義下，這也不算是IFS的研究對象。

如果我們同意IFS概念的重點就是在於FS／IFS的動態關聯和其歷史過程，那麼〈洗車〉一文在界定研究範圍時，已把研究結論預設進去了。（因爲它說研究範圍可以用有無營業執照來區分，是因為洗車業有此特性。這是一個古典的循環論證的謬誤，讀者應當很容易看出。其實「特性」應是研究的結論，卻先被用來界定範圍）因此〈洗車〉的研究課題：(1)路邊洗車的研性、成因；(2)路邊洗車與相關正式行業者之關係；(3)洗車業發展的趨勢及策略。（P.3）它們可能的解答，和針對課題所能提出的假說，都已被「研究範圍」相當程度地限制死了。

4. 正式／非正式部門的結構關係說明不全：

由於上述理論上的問題，〈洗車〉對FS／IFS關



係雖有第四章專論之，但其解析也是相當片面的。這章的理論架構應該是由圖2-1:FS/IFS關係假設。(P.14)發展出來的。正因為FS/IFS的界定標準是有無營業執照，且研究的範圍限於洗車業之內，所以它呈現的只有橫的結構關係(即：路邊洗車/電動洗車/修車店的同行關係)，和片面的縱的關係(例如：家庭製臘廠、切貨中心和路邊洗車的關係)。

細究來看，實證資料和分析的重點都集中在橫的結構上(或用新古典的概念說，是集中在供給面內部的結構)。然而我們宏觀地看路邊洗車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裡的位置時，可以發現內部結構根本不是關鍵性的問題，關鍵在於外部結構(縱的結構)，即需求、供給和市場機制三者的結構關係。簡單地說，就是誰洗車、替誰洗車，多少錢才洗等等。〈洗車〉沒有清楚的分析縱的結構，更沒有分析第三向度—時間(或歷史)的結構，因此它無從掌握路邊洗車的真正結構上的功能，即：(她)他們提供的廉價、有效率的勞務，使社會少數有車階級能以極小的代價順利地再生產。

這才是路邊洗車業存在的關鍵性原因。這種直接的、間接的(例如：計程車。計程車能廉價的洗車，也是降低營運的成本，使經常坐計程車的人的消費水平不致提高)社會關係的結構，在〈洗車〉裡都消失了。這個盲點在其圖4-1:路邊洗車業與相關業者之關係圖。(P.63)更為明顯地暴露出來。

這個圖中，上下及左邊都是活動性的actor唯獨右邊不是actor而是產出的勞務，使社會關係被掩蓋了。試說明如下：

- 圖的上下是國家機器的actor，〈洗車〉認為他們經常「剝削」洗車業者。
- 圖的左側是貨品及勞務輸入的來源，也是以actor來標示(材料行和零售商，但家庭工廠不見了)。
- 有趣的是圖的右側應該是需求面的actors，作者自己也用六角形框框來表示是消費者的位置，但框框裡卻是產出勞務的種類，不是actor。這樣一來路邊洗車在結構中關鍵性的社會關係，可能是最嚴重的不平等關係，就從圖4-1裡消失了。我們如果將右側三個框框裡分別改為「高收入汽車主」、「中收入汽車主」、「私人司機」或「計程車司機」等，那麼廉價洗車供養了什麼人、它被那個階層剝削，就甚為明顯了。

在理論上〈洗車〉並沒有著重於顧客社會階級的區分，在實證資料上也缺乏這方面的數據。問卷中就沒有試圖區分顧客的社會階級(P.99)，但表3-31、3-32和3-33(p.p.47-49)又有顧客職業別的分類，不知從何處得來

。且分類中最大一項是「其他」(分別是54.1%和53.3%)，使得分類的用意極不明確，無法從中找出顧客的社會階級分佈。

6. 部門內的社會關係(尤其是性別)沒有考察：

〈洗車〉把部門內的社會階層都視為同質的。IFS常是小規模，家庭化的活動，但並不表示它內部沒有階級差異。〈洗車〉的問卷沒有涉及此問題(事實上IFS的階級特性很可能無法透過問卷來測量)。除了第26頁、表3-6之外，實證分析幾乎沒有在論理上解說這個區別。從受訪記錄摘要來看，從業人員的社會關係至少可定位出：僱主、受僱、自僱、地主和家庭無償勞動等的階級差異，它們和FS的性質有無不同，〈洗車〉沒有說明。

〈洗車〉更完全忽略了性別和家庭結構在IFS中的角色。作者提供的實證資料顯示，男女在路邊洗車結構關係中有巨大的差異，例如：女性從業者佔61%(表3-1, p.18)遠高於全國婦女勞動參予與率(40%)；相對的，所謂正式部門中，女性從業者只佔12.5%；女性汽車主(顧客)卻只佔總顧客的9%(表3-3, p.10)，只有男性的十分之一！受訪從業人員中，26.2%(各項最高者，表3-16, p.33)進入此行業前從事「家管」，也就是無償勞動者(不是〈洗車〉所說的閒置勞動力)，她們進入此行業後仍然從事「家管」，這個責任並不因此減輕。訪談摘要顯示，女性從業員都有兩份工作，即洗車(可能有償)和家務勞動(絕對無償)；還有三份工作的情況(p.41)。她們偶而變成企業主，大部分是因為丈夫生病。一般解釋女性工資普遍低的理論，常認為是因為她們被社會分工規定在「家管」的位置，因此她們從事的有償勞動是份外的工作，被視為只是補貼男性家庭收入的次要活動，因此報酬可以被壓低。這個簡單的理論顯然無法解釋路邊洗車業中女性地位的特殊性。〈洗車〉並沒有試圖去解釋這個特殊性，從它訪談樣本中女性偏低的比例可以看出它把女性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比較表3-1和3-2，女性從業人員佔61%，女性受訪者只佔46%)，希望以後IFS的研究中能重視這個問題。近年國際上IFS研究在概念重要的擴充之一，就是把性別和分工的關聯當作主要的因素來分析，〈陳文〉及〈洗車〉沒有介紹這個新發展。唯其爭論甚多，應另文說明。

7. 所謂IFS較自由的謬誤：

〈洗車〉多次強調在IFS就業比較自由(p.35、36、41、42、43和87)比片面的概念有必要加以澄清：

(1)IFS的工作相對於FS(例如工廠)說來是比較自由的，但這自由不是無中生有、自發而來的，它是因為社會關係的不同而產生的。大部分的勞動者在IFS覺得比較自由，是因為她(他)們從受僱變成了自僱，是階級

的改變帶來的自由，不是行業本身必然的自由。

(2)在IFS的受僱者也可能是較自由的（例如工作時間較具彈性），這是因為FS在台灣並不明確，沒有提供一個有保障的工作環境；因此當福利、保障、工作條件在FS和IFS相差無幾時，勞工才可能放棄極低的保障，而選擇自由。

(3)IFS之所以「自由」是因為它是個不被規定的部門，在整個被規定的社會中有其功能。它的工作時間可以比較長，它可以隨意擴大或縮小生產組織，因此它是比較「自由」的，但是這個自由只有在它對另外一些人有用時才存在的。當我們發現到IFS較自由的同時，必須也去發掘誰在這個自由中真正地佔了便宜、社會為什麼要創造或保留這個自由。

(一)預測及建議的問題

以〈洗車〉不健全的理論架構自然無法清楚地分析IFS活動，按它理論分析後所提出的建議，必然也只能片面地解決問題，甚至使問題惡化。基本上〈洗車〉的解決方案是循ILO的方向——把IFS加以正式化（p.65, 80, 81, 87），規定業者必須在合法土地上，以合法登記的身份營業。這種方案早已在攤販問題上實驗過，是個歷史的失敗；公有市場不但沒有解決攤販問題，反而使攤販集中和增多。所以規劃洗車特定區，把路邊洗車合法化是非常不實際的建議。除了不可行之外，我們尚可從較高的層次來討論這個提案。

1.〈洗車〉對台灣的交通體系和洗車發展未加質疑。

台灣的經濟及都市結構根本難以支持一個汽車文化，全世界只有美國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才能「製造」出一個以汽車為主，公共交通為輔的社會，並留下了許多惡果。台灣在整個都市發展過程中，非常吝於投資於公眾捷運系統，而以品質及安全都較差的機車來解決中低收入者的通勤問題；近年有一部分的人消費水平提高，而改用汽車通勤時，立即造成了交通及都市問題，甚至使沒有汽車的市民通勤品質惡化。在這種狀況下，實在沒有必要對汽車的廉價服務加以制度化，間接鼓勵汽車的成長。

2.建議案將造成公共設施的分配不均。

台北市公共設施用地目前已普遍開發不足，公眾應享有的都市權利幾乎都被剝奪。為了把路邊汽車正式化，使原來供公共使用的公園綠地（加油站和停車場之外，唯一非汽車導向的公共設施），在此政策下又被犧牲，都市建設資源將更不公平地集中於汽車使用者身上。

3.〈洗車〉鼓勵手工和機器合併使用，並貸款給部分業者，幫助其機械化，會造成新的問題：

(1)洗車服務中其實只有洗車一項能自動化；打臘和內部清潔都無法機械化。所以鼓勵自動化的結果很可能是：

企業單位合法化、洗車部分機械化，而其他部分勞工非正式化。（美國加油站洗車就是明證：自動洗車機出口處總在一群非法移民或少數民族的廉價勞工在等著做hand wax的服務）

(2)洗車機一台可抵五個人工（p.70），洗車機械化後，減少就業機會，和〈洗車〉原來聲稱IFS的優點——提高就業率，相衝突。而且按〈洗車〉所說；國內機器易傷車身、國外機器不會（p.54），所以洗車業的機械化也會使國內機器製造業就業人口增加，只會使進口量提高。

(3)即使機械化是採用國內機器，也增加了機械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但是勞工地位和工作條件在製造業沒有提昇，則勞動力仍然會被IFS吸引，轉做其他非正式活動了。

(4)在空間分佈上，原路邊洗車集中於數個地區路段（p.p.19-23, 86），呈不均衡分佈；但建議案中卻試圖將之均勻配置於各區位（謂之「分散式集中」p.81，並以現狀不均勻分佈所得的數據，來推算未來均勻分佈的數量。）提案和現況的空間分佈不相配合，很可能造成管理上更多的困難；為何如此建議，會有什麼可能的後果，〈洗車〉並沒有詳細的說明。

如果〈洗車〉一定堅持它的建議，對於此提案我們也有幾點補充的建議：

1.如果非要提前開發公共設施保留地供洗車專用，其費用應該由該區汽車使用者支付。不僅「路邊洗車區」如此，加油站和停車場的建設費用也應隨汽車征收，以限制私人汽車的成長，並使資源分配公平化。

2.如果變更公共設施保留地用途（例如公園變成洗車場），即使是暫時性的，也必須有公共參與立法的程序。

3.洗車業受僱工人應准予參加勞保，組織工會，家庭和自僱者也應組公會，且有急難互助基金的設置，並在受保人支付較高（比受僱者）保費的條件下准其參加勞保。

(二)IFS研究在台灣興起的社會意義

在討論完了〈洗車〉一文具體的理論和建議的問題之後，我們將試圖分析IFS這個新概念為何在這個歷史時刻被引進，以及它究竟代表了什麼知識性的社會意義。

1.IFS活動的現象是舊有的，只有用來解釋的概念是新的。

在台灣；對〈洗車〉所稱的「非正式部門活動」的研究早已在IFS概念被引進前就已經存在了。例如違建、攤販和貧民生活，都是社會學和都市計劃研究的古典課題了。傳統研究的理論常以「貧窮」、「邊緣」和「雙元」來分析IFS的活動，顯然近年由於都市問題日趨複雜，且按傳統理論提出的建議基本上都失敗了，所以必須有新的概念來解決這個舊有的僵局。

2.然而IFS只是「新」引進的概念，內容卻仍是「

舊」的。

它的陳舊包含了兩種意義：(1)IFS在七〇年代初即被ILO（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應用，之後被多方批評和修正，在理論上已和當初類雙元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陳文〉和〈洗車〉大致上仍遵守1973年的Hart模式，故謂之陳舊；(2)〈洗車〉仍把IFS當作一個正規經濟外的落後部門，沒有看到活動的歷史及結構的意義，其解釋力和傳統的（IFS概念出現前的）雙元、邊緣論沒有太大的差異，所以其理論內容可說是陳舊的。

3. 著重主流，缺乏批判。

從七〇年代起至今所累積的IFS文獻，其路線基本上可分為二支：主流的一支是圍繞ILO和世界銀行所作的研究和政策建議；批判的一支則試圖修正和批評ILO和世界銀行對IFS所採的態度和措施。

世界銀行是資本主義中心國（尤其是美國），以金錢介入第三世界社會發展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其操縱第三世界經濟政治的實情，Payer（1981）書中有詳細分析，讀者可參考。ILO是聯合國全力支持的研究機構，它對各國勞工就業問題加以研究，並提出建議案，再由聯合國其他組織向該國政府建議。因為它沒有實權，因此不像世界銀行一般地赤裸裸地介入他國政經發展，它也相當地包容了一批較具自由傾向的學者，而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但在國際政經的大環境，和聯合國維護世界秩序的本質下，ILO擔任保衛中心國既得利益的角色，是被結構性地決定了。因為它提出的建議案是為了緩和社會問題，不是要解決根本的矛盾（例如中心對邊際的支配）。〈陳文〉第98頁也提及，Leys曾批評ILO助長了新殖民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陳文〉及〈洗車〉的文獻回顧把IFS研究的主流和批判二支大致都涵蓋了，但是對於批判的論點往往是語焉不詳或斷章取義。〈陳文〉不涉及實證研究，但該文第四節例舉AID（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建議案，當作IFS理論應用的正面性範例。AID是美國干涉他國政經的前鋒，這在第三區世界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實，〈陳文〉卻不加說明地予以讚揚。〈洗車〉繼〈陳文〉之後，犯了同樣的偏差；它在理論回顧時，相當沒有系統地提及ILO和WB有關IFS的假設被否定和修正的過程，但是如果細讀其實證部分的架構，方法和結論，卻又完全沒有脫離二元論的基調，令人費解。曾有人稱台灣社會學深具「加工」性格，〈洗車〉的實證研究顯示，它甚至是「負加工」的；因為它在研究的過程中，反而把進口的「原材料」（知識上的經驗）破壞了。

4. 台灣IFS研究在意識形態上的具有維持現狀的功能。

傳統上被用來解釋現在稱為「IFS活動」的概念，

不外是「貧窮」、「邊緣」和「雙元」等概念，至今已吸收了過多的意識形態的「指涉」，在使用它們時無法避免同情或排斥的兩極化情緒（通常具有政治性的內容）。當「社會問題」持續擴展，並且由它導致的「混亂的」都市秩序可能對「政治」權威構成威脅時，除了採取實際行動之外，就必須替這些概念，和分類到這些概念下的活動和人口，換上新名字。（前例如「貧戶」換成「小康戶」）

IFS概念在1984被介紹之後進入實證研究階段，和台灣1984—85年失業率達到高峯應不是歷史的巧合，從此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學如何改變它的範型，去面對新的社會危機。從此觀點，IFS在意識形態上的效果可能是兩面的：(a)它在台灣是一個新的概念，因此似乎比較「中立和具學術性」，它「理性」的內涵也使傳統概念如「貧窮」和「邊緣」等所包含的政治性指涉中立化了，而降低了概念的社會意義；(b)相對的，它比「貧窮」或「雙元」論更具分析性，因此同情這類活動的研究可以脫離情緒和人道的層次，而進入結構的層次，使批評更為有效。不幸的是，就目前的三篇論文看來，它們產生的效果是偏向於(a)的，即試圖把IFS活動非政治化。

〈洗車〉片面地分析IFS的功能，避而不談它的起因和後果，因此掩蓋了IFS可能的顛覆性的內容，同時它卻又清楚地呈現了IFS功能上保守的政治內容：可以鎮暴（為收游民以免成暴民）及分化工人（控制FS工資）的工具（p.11）。

國際上對IFS的研究，大部分是由聯合國，世界銀行和ILO等跨國機構所支持；台灣因為國際地位上的孤立，使社會學者無法得到類似的政治和經濟的支援，雖然因此喪失了一些研究的機會，但也應當使社會研究較能夠自主才對。然而從〈洗車〉在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上與跨國機構主流的模型不謀而合看來，可見社會學理論服務既得利益的功能，並不需要赤裸裸地金錢干預，或是帝國主義的政治陰謀；而是在相同的社會機制下，為了相同的政治及社會的理由，相同的社會範型得以滲透和被運用。

三、結 論

以上以條例的形式分析了〈洗車〉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敘述應算簡明，為了強調，在此重述幾項論證：

1. IFS活動是動態的，歷史的過程；〈洗車〉把它當作靜態的，可單一界定的活動。
2. IFS是被FS界定的，FS的特性必須由社會經濟狀況加以歷史定位；〈洗車〉只以活動單位的法權地位來界定，是非常狹義的界定方法。
3. IFS是充分被整合於當地社會和世界經濟中的部門，是被有意保存和再創造的；〈洗車〉只顧及片面的功

能，沒有分析結構上的整合。

4. IFS不是同質的，它本身是相當異質的，尤其是性別差異，〈洗車〉沒有注意到。

5. 〈洗車〉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基本上是因為它有維護現狀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學術」的失誤。

台灣目前正面臨政治及經濟再結構的過程，我們可以預測FS/IFS的區分將會兩極化，IFS的活動將會擴大；因此類如〈洗車〉的研究相當重要，它對實證資料所下的苦工也非常值得鼓勵，本評論的目的只是希望今後此類研究，在理論架構上能掌握本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性，不要只是片面的觀察一部門內的性質。

參考文獻

- 李 瑟
1982 〈地下經濟——啃噬經濟根脈的地鼠〉《天下雜誌》11月：10-20。
- 周 鳳
1986 《都市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以路邊洗車業為例》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 周薄通
1986 〈老神在在的大企業主——從兩個實例看他們如何閹割「勞基法」〉《前進廣場月刊》2:66-69。
- 陳小紅
1984 〈開發中國家都市「非正式部門」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50:79-109。
- 中央日報
1987 〈工業團體立委張世良建議「經濟一清專案」〉。海外版，4月3日。
- Pahl, R. E.
1984 Division of Labou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ortes, A. & Walton, J.
1981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uational System. OrP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1983 "The Informal Sector : Definition, Controversy and Rela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7 (1) : 151-174.
- Redclife, N. & Mingione, E.
1985 Beyond Employment : Household, Gender & Subsistance.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Safa, H.
1981 "Runaway Shops and Female Employments : The Search for Cheap Labour", Sign. 7 (2).

Young, K.

1978 "Modes of Appropriatio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 A Case Study from Oaxaca" Kuhn, A & Wolpe, A.M. Feminism and Meterialism. 124-154,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四、附錄（翻譯）

〈非正式部門：界定、爭議和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作者：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

出版：Review, 1983, VII(1):151-174,

（一）導言

社會科學中任一領域的變化，都可由新塑造的概念的特性及數量來判斷；這些新概念是針對現實而發的；它們可能零星的出現，但當它們出現時，必然標示了專業裡重大的變化。這類概念把近期向正統挑戰的知識凝聚起來；更重要的，它們把學者研究的焦點移到新的、過去被忽視的方向上去。

在國家發展的研究上也不例外。在過去30年，它被「現代化」、「經濟『起飛』」、「依賴性格」、「邊際性」、「不等價交換」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概念所影響和指導。每個概念都引起了可觀的理論論述(discourse)，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被用來檢驗各個概念所包含的範圍；並把新概念所導出的假說與舊理論的假說加以比較。

近年來發展領域裡產生的重要概念之一，就是「非正式經濟」，或稱之為「非正式部門」。就像一些過去的例子，它因為掌握了相關學術界共有的洞見，而很快的被接受。它之所以對發展理論學者和研究人員有吸引力，是因為它重新界定了非先進國家的貧窮，尤其是都市貧窮的性質。

這個概念指出了窮人並不是一堆不參加現代社會的廢人，只「活」在那而已；相反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動態的階級，這階級裡的人從事無數種的活動，也許得到的收入不高，但至少供他們和他們的小孩能維生下去。這種看法比「邊際性」（以往常被用來解釋貧窮的字眼）的看法較合於最近研究的結果。「邊際性」的含義常是被動及排他的，而不是動態的經濟參與（參考Portes, 1972; 比較Perlman, 1976）。雖然對於非正式部門是否是動態的經濟參與，學者的共識比較低，但此觀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避免了相關概念所涉及的雙元涵義，例如「傳統部門」、「前資本主義經濟」和「邊際性」，這些概念暗示了一個社會和經濟體系可分成兩部分：一個是現代的、完

全被資本主義化的、被整合進世界文化及貿易的部門；另一個部分則是完全相反的部門。

下一節我們將看到，IFS也是在雙元論傳統下被界定及被考察的，但是幾個最重要的研究否定了此雙元的觀點，並揭示了正式和非正式部門間的接合和互補，兩者都是一個經濟體系下的一部分而已。以此觀點，「非正式部門」是指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都市工人在現存經濟秩序內所經常地、完全地參與的活動。

在前兩篇論文中（1978a,1981）我回顧了現有的、有關IFS的實證研究，並在不等價交換和全球積累的主題下，探討了IFS和第三世界都市化的關係，這篇文章不再重覆當初的發現。現在非正式部門已成爲不同學派流行的研究主題，我將集中於探討對此概念不同的界定。

這個分析分爲三個部分：

1. 近年被採用的主要概念的回顧，及對它們研究結果的批判。

2. 作一個歷史上的澄清，揭示出在低度開發的資本主義經濟下，被界定爲「非正式」的活動的起源和發生的地點。

3. 關於研究策略上的問題的討論，以便定出可能的研究計畫，這又包括：

(1) IFS擴張或縮小和不同國家形式兩者間的關係；

(2) 在先進工業國裡，IFS經濟的快速成長。

(二) 非正式部門：「避難所」、「勞動力市場」或是「生產方式」？

智利社會學家Raczynski在她回顧文獻時，依導出各概念的假說的不同，區分出三種IFS的定義（Raczynski, 1977）；按她所分，IFS的概念被用來表示：

(1) 一組經濟的單位、個體或企業；

(2) 經濟活動人口的一部分；

(3) 一個社會經濟階層。

我們先從(3)的定義討論起。

作爲一個社會階層，IFS代表了人口中，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一部門。他們主要存在於都市化的地區。「地位不利」（deprivation）由就業、收入和消費的管道和水平等多方面來界定。Raczynski指出，這種界定只是把「貧窮」的舊標籤（例如「傳統的」或「邊際的」）換上新名稱而已，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對於貧窮狀況的新洞見，因此可以放棄不用。但同時也要鄭重指出，對「傳統的」和「邊際的」，我們或是暫時地將之替換，或是駁斥它們既有的意義，其用意是：非正式經濟不能局限於解釋窮人中最窮的人，這個部門中也必然有一定範圍的就業和收入的差異存在，此內部差異須加以考察。

聯合國支持的一些研究，是從(2)觀點出發的，把正式

經濟當作勞動市場的一部分，例如：由ILO和拉丁美洲區域就業計畫（PREALC）所指導的研究案。根據此觀點，可用來界定IFS的特點是：它們需要的資本較少、技術較低，所以此業容易進入；攤販、管家、傭人、修理小工、門房等類的工作，不需要特別的訓練或可觀的資本，任何人都可勝任。在此部門的工人教育程度較低，且女人、小孩、老人和新移民在此部門中的比例高於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他們的工資遠低於正式部門的工人，而且移出非正式活動的可能性極爲有限（Gerry,1978;Tokman,1978）。

以此定義爲基礎的研究，幾乎全部都在試圖量化非正式活動的大小，或以其吸收的經濟活動人口或創造的就業機會，或兩者同時，來度量IFS的大小。爲了此量化的目的，「非正式就業」在操作上就被定義成以下範疇之一或多個的組合：家管服務、自僱（不包括經理和專業人士）、無償家庭勞工，以及從5人到50人員工的「小」企業的就業工人。基於這些界定，PREALC的調查估計，在拉丁美洲國家裡IFS佔了30-60%的都市就業率。（Raczynski,1977:40-41）。

在這個觀點下，理論和操作的定義之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理論的定義——易進入、低技術、低工資——和前面所討論的社經階層的定義沒有太大的不同，它只是以強調就業而不強調消費能力，來替貧窮取新名字而已。然而，由實證的（操作的）定義——以就業形態而不是個體的特性來界定——其發現和理論定義下的期望常常不相符合。

例如有些調查發現，女人和新移民在IFS中並不一定有超高的比例。另外有一些報告指出，在許多非正式企業中有重大的「進入的障礙」，障礙的形成是需要相當的技術或足夠的投資。最後，近期在哥倫比亞的調查發現，當藍領工人在正式產業裡的平均薪資和IFS的薪資相同時，工人顯著的較喜歡進入IFS（Lopez et al,1982）。

爲什麼會如此呢？此觀點所支持的持續的經驗上的反證（譯註：IFS有時比FS有利），已反駁了一些IFS觀念的代言人的觀點；它被誤解的程度超過了概念本身的失誤。第二個學派（譯註：主張IFS是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所用的定義爲三個缺失所困擾：

第一，它排除了大量的人口。即使把上述全部的就業形態都包括在內，操作定義仍把「直接維生生產」（direct subsistence production）——一種主要的非正式活動，例如：都市小農地耕作，飼養動物及自力建屋等活動——排除在外了；隱藏在家裡，以各種計件方式工作的隱藏性工資工人（disguised waged workers），也被排除了。雖然在理論上車衣婦或類似的工人是「自僱」，但因爲不

易見到，而且就業形式不穩定，所以常在統計中被遺漏。

第二，此定義忽略了IFS內就業的多種階級差異。從此觀點所進行的調查，區分出數種非正式的就業形態，然後假設它們是「相同」的現象。我們幾乎可以說IFS包括了和FS一樣各種的活動，而不嫌誇張。IFS就業包括了企業主、他們的工人、自僱的工匠和商人、被正式公司僱用的隱藏性工資工人，以及從事直接維生活動的工人。這些職級差異構成了看似不循常理的結論：非正式工人經常比正式的藍領工人有較高的工資，且正式部門的工人常常離開他們「安全」的工作機會，改做一個非正式企業主來開創新事業（Peattie,1974）。

第三，這些調查忽略了同時在FS和IFS就業的可能性。這兩種活動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在低度開發國家，正式的薪資工人從事其他自主性的經濟活動是極常見的。同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期、在正式簽約的工作、非正式工資的工作、或獨立活動間變動。因此企圖把個人明確地劃分到FS或IFS，並以此測量IFS的經濟規模，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不只因為這種估計不可信，更是因為它使人無法注意到現象較動態的部分。

在這三個缺點的背後其實是暗含了以雙元論來把IFS界定為一勞動市場。在本質上，這觀點和早先區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落後前資本主義經濟的概念無太大的差別。調查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大小，只是試圖確定多少人被各部門所吸收。在如此做的同時，他們犧牲了此概念中最動態的一部分，即：了解邊緣經濟如何以獨立卻又整合的系統來運作的機會。

最後，我們來考察(1)類定義，它把IFS經濟界定為一組自主的企業。Raczynski指出，此觀點為了把FS從IFS生產單位中區分出來，必須設定一些標準，企業單位的大小是最常見的一種標準；小的，及自僱的企業就被分為IFS；其他的判準包括：投資額、技術和生產力。每個判準都是可批評的，例如，大小就是一項不健全的標準，因為FS也有自僱式的工作（自由業專技人員等），而且大和小之間的界限常是任意決定的。同理，非正式活動是否總是低生產力也不甚明確，FS也有相當明顯的、由於官僚作業產生的次級就業（Subemployment）。同時也該指出，其實相對於投入的資本額，IFS企業的生產力常等於、甚至超出FS企業的生產力（Raczynski,1977:10-11；Lopez et al,1982）。

在此觀點下，最有希望的研究方向該集中注意各經濟單位裡的不同生產關係。正式部門公司的特性是有合約的就業機會，同時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權威的系統，和僱用及解聘的條件。工人被他們自己的組織所要求及推動的勞工立法所保護。在此狀況下，個人出賣有明文規定的長

度的勞動時間給公司，換回固定的貨幣報酬（Moser,1978；Peattie,1980）。

IFS的生產關係正好相反，僱用或解聘常以口頭上曖昧的詞句來決定，並沒有工時，最低工資、意外、疾病和退休等相關的法令來保護工人，工作的狀況和責任可能隨時改變，工資給付的時間和數量也不能預測，這些生產條件顯然對僱主有利，他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僱用更多的工人，而又不多費事，也許，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勞工遠比正式合約勞工更具「彈性」，使僱主可在經濟景氣時僱用那些可以在不景氣時輕易解僱的人（Lomitz, 1977；Roberts, 1978a:Ch.5；Birbeck, 1979）。

當重點集中在生產關係上時，非正式部門這個概念才變得有價值起來，因為它提供了一了解它在整個經濟中有何職能的一個基礎。但是，這個定義在下面兩點說來仍是不足的：

第一，集中於企業，它忽略了應包括進IFS的幾種個人和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忽略了由正式部門公司個別僱用的隱藏性工資工人，和全時或兼差的維生勞動力。

第二，這個定義不能有系統的探究在一整合的經濟結構裡FS/IFS活動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它只著重於兩部門各別的特性，此觀點延續了別種定義下二元論的看法，因此基於此觀點進行的實證研究（如Mazumdar,1975,譯註：世界銀行）和勞動力市場取向（譯註：(2)類定義）沒什麼不同。如果說後者是要找出IFS吸收的勞動力有多大，那麼前者只是要量化IFS產出的勞務及貨品。

非正式部門不同的定義，和其所導出的矛盾，使此概念過早地被否定了。以我看來，問題在於各種把勞動力市場和企業區分為全然正式和非正式的企圖，都是缺乏歷史觀的（ahistorical）；它們不能掌握不同生產關係相接合（articulation）終而產生IF/IFS區別的過程。缺乏歷史背景的定義，常常把IFS當作和「正規」經濟特性相反的一種「新」發展。然而有歷史觀的分析不但能指出實際狀況正好相反，正規經濟才是最近出現的現象；同時也指出實際狀況遠比去描述一些被分割為二部門的個體或企業來得複雜。

(三)非正式部門的起源和組成：

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下，FS和IFS的區分是不存在的。此區分不存在並不是我們今日所指的「非正式活動」當時不存在，而是因為根本沒有一個適當的、可供對比的標準。「非正式」的概念可以定義為家庭成員所從事的，除了簽約的、合法定期的工作之外的，製造收入（所得）的活動的總和（Portes, 1981:86-87）。等會兒我們會發現這定義需要再轉譯成更廣義的、結構性的專有名詞，但它提供了一個出發點。經過如此界定，此概念包括了

廣大的範圍，包括直接維生生產、無合約規定工資的工作、工商業和服務業的獨立投機事業等。

這些活動不但平常，而且頻繁地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在工業化國家裡進行著。不必仔細回顧文獻，就可容易地指出，任何涉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倫敦、曼徹斯特或紐約的工人階級的生活資料中，都可找到豐富的例證（原註一）。如果這類的活動在當時是如此的平常，那麼現在究竟有什麼是新的現象呢？

這問題可由兩方面回答：

第一種答案：一般而言，在二十世紀有一群依賴定期工資維生的工人階級快速成長，此成長正如Wallerstein (1976) 指出，是全球性的無產化 (secular trend toward proletarianization)，它歸因於數個因素。其一，帝國主義使剝削移往殖民地；其二，資本家為了實現貨幣利潤必須擴大國內市場。但是此無產化過程更常是因為有組織的工人為反剝削而進行的鬥爭獲得了勝利。

階級鬥爭的結果除了使工資相對提高之外（因此可以減少從事其他獲取收入的活動），另有兩個結果：一、非直接工資，即保障個人免於疾病、意外、失業及年老的給付的增加，這種給付在美國被稱為「小額優惠」（fringe benefits），它是報酬中重要的一部分，使工人免於從事緊急經濟活動來維生（原註二）；二、階級鬥爭積極地限制了僱主任意僱用和解聘的自由。

在經濟史容許的推論範圍內，我們可說十九世紀的薪資工作類似於今日被稱為「非正式」的狀況。在有組織的抗拒迫使僱主就範之前，他們總是樂於不去支付間接工資。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們希望勞動力的供給（除了過度短缺時之外）總是保持為一有彈性的商品。

由此觀之，非正式部門的興起不是「新」的現象，反而它的衰退才是。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下，一大部分的無產化免於任意的被解聘和僱用，也免於被迫從事其他的經濟活動來補貼不足的工資，更重要的是，這個穩定的狀態，不是由勞資權力的抗衡來維持的，而是因為它在國家體制內被制度化了。當無產化的程度已變得如此徹底時，國家的角色在此過程中也變得如此制度化時，使許多IFS的分析易落於兩個常見的陷阱：(a)把「非正式」當作「新」的經濟形式；(b)敘述它的特徵卻沒提到國家機構的介入（或不介入）。

第二種答案：在我看來此答案比第一種更深入。為了說明上的需要，我們必須把第三節所提的IFS定義重新改寫。從經濟結構的觀點來看，個別家庭不同的創造所得的活動是屬於不同的生產方式。藉自馬克思學派對生產方式的定義，IFS內可以區分為三種相關的生產方式：

1. 直接維生：這種活動包括了生產、獲取和維修消費

品。

2. 簡單商品生產及交換：以自僱的個別勞工為主，他們產出貨品及勞務並（或）將之在市場上商品化。

3. 落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兩種形式：①小企業僱用無保障的勞工。②大公司分包安排下的隱蔽性薪資工人。

以上三種形式，每種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下都非常普遍。前兩種輔助性的薪資勞工，其功能上是使「半無產化」的勞動力能生存下去 (Wallerstein et al., 1982)。致於第三種生產方式，它和資本主義在階級鬥爭開始進攻（後來導致勞工立法）之前，所存在的主要的生產關係是相同的。但是，對第二個答案（譯註：以生產方式所作的解說）的觀點而言，「新」的發現並不是這些生產方式竟然能苟活到現代資本主義時代，而是它們被現代資本主義再創造、並重組起來加以運用。

正統的發展理論認為上述的活動只是結構性地「落後」，遲早會在現代化的進展中消失。低度開發國家在此進展中落後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零星的維生領域、手工匠式的生產和類似的活動，在這些國家都應當常見。然而，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這些落後的生產方式不是單純的殘留下來而已，而經常是故意地被保留及再創的。

舉例來說，南非、南美安地新山區和中美洲的維生農作就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共存的，這些維生的領域主要是用來製造出能被資本主義公司僱用的人口，公司不必負擔養育這些人的費用，也不在勞工生病或年老時給予支助。當工人成為多餘或無用時，他們就回到保留區或印地村落 (Meillassoux, 1972) (原註三)。同樣的，一般被人認為在消失中的外包系統 (Putting-out system)，現在又在世界各地快速地成長。最後一節我們將考察它在先進國家中復出的現象，至於在低度開發國家，從衣服到房子都是由轉包下的非正式受僱工人生產的——幾乎無所不包。最近的調查甚至顯示，現代化過程正在逆向發展，當初努力採納正式、合約化勞資關係的產業，也開始重新回到外包制度 (Schmukler, 1979)。

和霸權部門 (hegemonic sector) 的關係，是落後生產方式被保存或再創的基礎。上述的活動之所以都可被稱為「非正式」，並不是因為它們在結構上相似，而是因為它們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減輕公司在無產化過程中應承擔的後果。因為它有許多機制有助於延遲提高工資，和逃避國家執行的勞工法，所以近年來各種非正式生產的編制得以重建。

至於這些機制運作的方法，在我1981年的書中已有詳細的描述 (Portes, 1981)，在此不重複說明，其重點在指出這些「修正」的 (ameliorative) 機能以兩種方式運

作：

1. 提供正式工人消費的管道，有關的活動包括：從事直接維生和簡單商品生產。它們生產的，或採購的消費品比較廉價，因此補償了正式部門的低工資。

2. 逃避最低工資規定和間接的福利安全給付。這種活動包括：外包制度和轉包安排。它們使大公司能直接地汲取無保障的勞工資源，又部分地保持了勞動力供給的彈性。

由此觀之，「新」的現象並不是現代經濟取代了早期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是隨著合約化的生產關係的進展（加上公司有意規避合約化後新增的支付），早期和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被「現代化」了。大規模地利用落後的生產方式來打擊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是當代非正式經濟真正重要的意義，這個過程已普遍到不考慮它就無法了解現在發展的趨勢了。

總而論之：

第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非正式部門不是勞動力市場裡「新」的部分；

第二，它也不是由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延留至今的遺跡所組成的；

第三，它具有內部的多樣性，是由與資本主義經濟之功能關係所整合的舊生產體制中的重組部門所組成。

此外，有人因為IFS把各種異質過程歸納為一，因此反對IFS概念。第三項論證對此反對提出了解答。某些學者喜歡集中於維生領域，或是集中於動態的小企業；另外有人則建議以正統馬克斯思學派的「簡單商品生產」的概念，去取代IFS概念（Moser, 1978; Smith, 1981）。這些論證在強調結構上的多樣性時都是正確的，但卻無法看出把多樣經濟現象統一起來的基本歷史過程；這過程和中心及邊緣經濟裡的階級鬥爭的興衰是相應合的。早期工人階級的勝利是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元素，而資方對此勝利有組織的反擊，在落後經濟編制的復出及再結構中呈現出來。它們（落後經濟編制）的統一性，則來自被更新過的、被用來支持主導生產方式的共同功能。

(四) 國家的角色：

前面提到過無產化過程和現代化國家的關係。在本質上之所以有正式部門，是因為國家把階級鬥爭的結果加以制度化，成為勞工立法和執行的機構。因為如此，各經濟部門相對的規模及其內部的成分，會被國家政策的變化所影響。

這個影響的方向，並不能直接從國家的階級取向中追查出來。一個親資方的政府不一定會削弱執法機器，並把特定的經濟部門加以「非正式化」；當然這種政策是可能的，它會導致非正式活動的擴大，並且使FS/IFS之間的界限變成模糊不清。但是同樣的，我們也可理解一個

親資方的政權會採取擴大國內市場的政策，來推動經濟成長，因此國家應當維持並加強執法的程序，以便減少薪資低於最低工資的勞工數。

類似的曖昧性在親勞工的政府裡同樣可以發現，在某些時候，非正式企業可說是對勞工超剝削的場所，而必須加以剷除。但在另一些時候，國家會認為大的外資和本國企業的資本密集的生產技術，是有害於國家發展的；政府可能因此決定以勞力密集和當地技術的投資計畫來取代之，如此IFS活動會快速擴張。

這假說上的兩難可由具體實例來說明。

拉丁美洲幾個軍事政權的興起，造成了對這種國家形式的特性及其造成的可能的後果，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原註四）。很明顯的，這些政權在資本主義的架構內追求經濟發展，他們倡導外銷，並且把國家對外資（銀行及產業公司）開放。也明顯的保持反勞工的傾向，試圖瓦解工會活動，並使工人階級的要求中立化。

除了這一般性的傾向之外，關於拉丁美洲威權政體對FS/IFS生產方式相接合的衝擊究竟如何，仍然很不清楚。這些政權實施的政策產生了兩個部分相矛盾的趨勢；在初期，所有的威權政體都以控制通貨膨脹，和解除市場限制來追求經濟政策的理性化，特定的政策包括：出售無利可圖的國營企業、取消對基礎消費品的補貼，並使其價格提昇到「自然」水平，卻又在工資上不給予相當的補償。這些政策的總後果是經濟蕭條，導致失業人數劇增。

這個後果是被故意造成的，並且合於政府的目的，因為在本質上，軍事威權政體的興起，就是支配階級對「早熟的」無產化過程（和其所產生的一群有保障的勞工階級）的一種反擊。這些政權的至高無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獲得政治控制之後，用縮小正式部門的規模為手段，把工人階級鬥爭的成果反壓回去。失業率的劇增是此政策合理的反映。因為國家的支助極低（甚至完全沒有）；被FS逐出的人口唯一的選擇就是從事維生、自僱或無保障的受僱等緊急的經濟活動。因此，軍事威權推行經濟理性化的政策所產生的結果是：正式/非正式之間的平衡狀態改變，非正式部門規模擴大。本地和外資公司大都因為此政策所推動的聘僱勞工的「自由之手」而受惠。

從另一方面看來，威權政府所執行的、持續反勞工的政策，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如果工會活動和勞工立法被充分的解體，公司則不再有外包的誘因，而情願利用理性化工廠生產的優勢。此外，如果工資夠低，並且勞工供給有足夠的彈性，正式企業就可以和小的、非正式企業在低價格市場上競爭，因為小企業原來唯一的優勢就是有超低工資的勞動力。這個過程的後果將不是IFS的擴大，而是消除FS/IFS的界限，回到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世

界。在此條件下，失業率將會減低，因為低工資和任用勞工的自由，會鼓勵公司增加他們的勞動人數。

在1980-82年間，南美南角（Southern Cone）的國家——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失業率都劇增。最近的數據顯示，智利和烏拉圭有20%、阿根廷有10%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處於失業狀況（原註五）。此數字對各個國家說來都是歷史上最高的記錄，這符合我們前面所提的經濟理性化政策會帶來的第一種後果（譯註：失業增加、IFS擴大）。

在另一方面，老牌的威權國家——巴西，則有不同的情況。1964起實施軍事統治的巴西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確比南角國家的極端貨幣主義要緩和得多，但巴西也仍然是保持反勞工路線的政府（事實上它是南美反勞工路線的創始者），二十年來對勞工不斷的壓迫，並沒有導致IFS擴大或變得重要，反而使之明顯地縮小，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地區如此。幾個巴西經濟學家皆指出；IFS的重要功能，例如提供大眾消費的服務及貨品，在聖保羅（Sao Paulo）附近工業化的地區並不存在；也沒有證據顯示大公司採取轉包的機制來降低勞動成本（原註六）。

只要這些經濟學家的報告是正確的，它就符合我們前面所提理性化政策導致的第二種結果（譯註：FS低工資、IFS縮小）。在聖保羅工業地區沒有FS / IFS明顯的分界是因為20年軍事統治使得巴西資方對勞工有壓倒性的優勢，此優勢由巴西擁有全拉丁美洲的最低工資上充分反映出來，所以資方不需要重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或是重建外包制度，今日巴西的資本主義是二十世紀科技和十九世紀勞工措施的混合體。在這點上，它和南角國家的經濟不同，南角那些威權國家，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趕上巴西，資方的優勢無法到達與巴西相同的地步。

上述例證是爲了說明兩個在分析IFS時重要，卻常被忽略的觀點：

1. FS / IFS的分界不是靜態的，也沒有一個普遍的趨勢使一部門必然易於支配另一部門。無產化的過程（和其導致的FS的興起）可以被停止，甚而逆轉。

2. 不同生產方式的接合，反映於FS / IFS的分界上；此接合追根究底是一個由國家控制的政治的過程。如果只在純經濟層面來分析維生領域、簡單商品生產或轉包措施，將犯嚴重的錯誤。它們的存在和功能有賴於反映階級鬥爭史的被制度化的國家措施。透過這些措施，勞工法可以被通過和嚴格執行；但同樣的也可以被廢止和忽略。

（五）非正式經濟的國際化：

不管把IFS當作新的發展，或當作是早期的遺跡，它們總是被放在低度開發國家的涵構中研究的。無庸置疑，直接維生系統、小企業和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奈

及利亞和秘魯比在美國和法國更常見。但這並不是真相的全貌。在工業化經濟和邊緣經濟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限，然後說IFS活動屬於後者，是把真相過於簡化了。根據一系列在美國及西歐進行的研究，它們所提供的證據顯示：和第三世界「非正式」相似的經濟活動正在歐美增長（Pahl, 1980；Mingione, 1978；Mazur, 1979；Bonacich, 1980 a；Badillo-Veiga et al., 1979；Sassen-Koob, 1980）。它們（工業化和組織經濟的IFS）的相似性，包括了活動組織和目的上的相似，也包括了它們都是近年來被有意再創的，而不是過去的遺跡。

美國的例子可用來作說明。目前有的證據顯示，美國的IFS藉著落後資本主義形式（原先被認為在消失過程中）的擴大而增長。從事生產直接進入市場、或從大公司轉包的勞務及貨品的小型非正式活動，近年急劇增多。在紐約市，“Sweatshop”（譯註：勞動條件極惡劣的工廠，十九世紀常見）的復活被譽爲挽回了成衣業外流現象的功臣，並使此行業的都市經濟復甦。在其他的大城市，如洛杉磯、舊金山和邁阿密，也有類似的運作，在轉包下生產服飾和其他的消費品（Bonacich, 1980b；Jorge & Moncarz, 1980）。

社會學家Sassen-Koob告訴我們；在紐約大部分的非正式企業是爲正式部門高收入的服務業者（例如：金融、經理和法律服務）提供個人服務，並逐漸形成了該市經濟的重心。食物處理、守衛服務、手洗衣物、訂作衣服等許多爲迎合有錢人需求的生意，都是由非正式企業提供的（Sassen-Koob, 1981）。這些生意都是勞力密集而且競爭激烈的，爲了生存它們必須有願意爲最低工資但長時間工作的勞工；國內的少數民族滿足了一部分的需求，但現今大部分的廉價勞工是由非法移民填補的。

美國非法移民的成長，可歸因於“Sweatshop”式製造業和個人服務業此種非正式部門的擴張。這些活動必須和一般在雙元經濟中被稱爲「次級」（Secondary）的部門區分開來（Gordon, 1972；Edwards, 1975）。在次部門的小企業也常僱用低工資的工人，但他們仍然在國家勞工法的管制之下，非正式企業的特點乃在於它們吃定了大量沒有公民權的勞工，而經常違反勞工法。非法工人爲了經濟上的需求及英文太差，更重要的是他們法權上的弱點，使他們無法爭取權益和抵抗剝削。

過去二十年來，數以萬計的非法移民來到美國，在美國製造出了和低度開發國家相似的、被稱爲「非正式」的落後資本主義關係。此部門裡無保障的勞工，使轉包的大公司、或向此部門購買勞務的個人受惠。僱用非法移民的費用遠低於僱用本地受保障的勞工的費用，才是偷渡移民潮持續不絕的真正原因（Portes, 1978b；1979）。

(六) 結論：

按照正統的發展理論所描述，工業化世界和低度發展世界是透過貿易、資本流通和科技來聯繫的。IFS的概念增加了此聯繫的複雜性。如前所述，這些生產關係在美國的再現，是由邊緣國家所進口的移民工人來維持的，無保障的墨西哥工人形成了墨西哥國內和美國西部的非正式經濟的骨幹；同樣的，哥倫比亞和多米尼加工人則形成他們國內和紐約市的經濟骨幹，因此在商品、資本和科技之外，我們必須加上勞工，作為聯繫目前先進和落後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此，對非正式經濟的注意，揭示了工業國自我矛盾的處境，因為在工業國內號稱已消失了的生產體制又大量的出現，表示了工業國竟然在模倣邊緣國家。IFS這個概念使人們注意到橫跨數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結構性的相似處，對此結構有系統的比較，使我們能期待對於經濟過程能有一較總體的了解，而不是像從前，把它界定成整個經濟的一些特別部門而已。

然而，我們也許可以推論：全部和IFS概念相關的辯論都是臆想出來的（artificial），因為這個過程自資本主義萌芽即已存在。

從一方面來說，推出這個概念只是把明顯的事實畫蛇添足而已，尤其如果把IFS當作新生事物看待時。第三節揭示了此觀點是難獲同意的，也揭示了合約勞工的興起，才是歷史上新的現象。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強調非正式經濟的動態又是正確的，因為它引起了對真實的當代過程有所注意。此過程是：為了反對建立一個法律與合約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趨勢，而重組落伍的經濟形式。幾年前，經濟人類學家如Meillassoux (1972)，Rey, Wolpe (1975)，和 Clammer (1975)，指出了南非部落維生生產和現代資本主義企業掛勾的情況。他們的研究肯定了南非和其他地方的維生領域是被當作現代部門的勞動預備軍（labor reservoirs），被加以故意保存的。但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強調這種掛勾其實只是一普遍過程，外顯的一部分而已。

今天這個過程在邊緣和中心國家的都市中普遍發生，它把小生產者和零工所從事的製造及服務的活動，和現代化公司聯接起來；這些生產關係造成了落後經濟下常見的低工資，和相對的高利潤（de Janvry & Garramon, 1977；Amin, 1976: Ch. 3）。在工業化世界裡，它們可能擴張的範圍下，這些生產關係將有助於某些特定部門，以擴大社會不均為代價，來助長資本的積累。然而在當代世界情勢下，美國及西歐的IFS復甦的趨勢也不是不可能反向發展，無庸置疑，這將是階級鬥爭本質，和其導致的勞動剝削形式的一個明確的徵兆。

原註

- 註 1：請看 Rischin (1962)，它是把種族和求生策略兩主題混合處理極好的例子，有關曼徹斯特的經驗，請看 Roberts (1978)。
- 註 2：關於此論證不同理論的觀點的說明，請看 Meillassoux (1972)，和 de Janvry & Garramon (1977)。
- 註 3：另一有關南非的理論上的分析，見 Wolpe (1975)。有關安地斯區域經濟的分析，請看 Roberts (1976)。中美洲相關的材料，則見於 Rivas (1974)。
- 註 4：有關此題目最重要的作者無疑是 Guillermo O' Donnell (例如他 1978 年的論著)，有關此文獻的總論請看 Collier (1978；1979)。
- 註 5：請看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倫敦出版，1982 年各期。
- 註 6：就我所知，有關此點最一貫的論證是 de Scruza (1980)；也請參見 Singer (1975)。

參考文獻

-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dillo-Veiga, Americo, de Wind, Josh & Preston, Julia
1979 "Undocumented Immigra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XIII (6) : 2-16.
- Birbeck, Chris
1979 "Garbage, Industry, and the 'Vultures' of Culi, Colombia," in C. Gerry & R. Bromley, eds., Caus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New York: Wiley, 161-84.
- Bonacich, Edno
1980a "New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as a Form of Cheap Labor," unpubl. m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1980b "U.S. Capitalism and Korean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unpubl. m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 Clammer, John

- 1975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in I. Oxaal, T. Barnett & 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ollier, David
 1978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XXX. (4) : 593-614.
- Collier, David, ed.
 1979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Davies, Rob
 1979 "Informal Sector or Subordinate Mode of Production A Model," in R. Bromley & C. Gerry, eds., Caus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New York: Wiley, 87-104.
- De Janvry, Alain & Garramon, Carlus
 1977 "Laws of Motion of Capital in the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X, (2), : 29-38.
- De Soura, Paulo
 1980 "A Determinacao do Salario e do Emprego nas Economias Atrusadas," unpubl. Ph.D. Dis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tate Univ. of Campinas.
- Edwards, Richard C.
 1975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Firm and Labor Market Structure," in R.C. Edwards, M. Reich & D.M. Gordon, ed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exington, MA: D.C. Heath, 3-26.
- Gerry, Chria
 1978 "Petty Production and Capitalist Pruduction in Dukur: The Crisis of the Self-Employed," World Development. 9/10, Sept./Oct. : 1187-98.
- Gordon, Davi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emploment.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Jorge, Antonio & Moncarz, Raul
 1980 "The Cuban Entrepreneu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ami SMSA." unpubl. m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
- Lomnitz, Larissa
 1977 "Mechanisni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Shantytown Settlers and the Urban System," unpub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Shantytowns, Gloggnitz, Austria: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 Lopez, Hugo, Luz, Marta & Sierra, Oliva
 1982 "El Empleo en el Sector Informal: El Caso de Colombia," Unpubl. ms.,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Univ. of Antioquia.
- Mazur, Jay
 1979 "The Return of the Sweatshop." The new Leader, Aug: 7-10.
- Mazumdar, D.
 1975 "The Urbon Informal Sector,"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21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Meillassoux, Claude
 1972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1(1):93-105.
- Mingione, Enzo
 1978 "Capitalist Crisis, Neo-Dualism and Margi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II:213-21.
- Moser, Caroline O.N.
 1978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XIII(1): 3-38.
- Pahl, R. E.
 1980 "Employment, Work, and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IV:1-19.
- Peattie, Liaa R.
 1974 "Living Poor: A View from the Bottom," Preceedings of the Coloquium on Urban Poverty: A Comparison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the U.S. Experience. Los Angeles: U.C.L.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1980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 Concepts of Dualism,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argina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I(5): 1-31.
- Perlman, Janice
1976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Purtes, Alejandro
1972 "Rationality in the Stu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IV(2):269-86.
1978a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the World Economy: Notes on the Structure of Subsidized Labour," Bright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Sussex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X(4):31-37.
1978b "Migr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VIII(1): 1-48.
1979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ssons From Recent Legal Mex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roblems, XXVI(4):425-38.
1981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A. Portes & J. Walton,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67-106.
- Raczyski, Dagmar
1977 "El Sector Informal" Controversias e Interrogantes, Estudios CIEPLAN. No. 13.
- Rischin, Moses
1962 The Promised City: New York Jews, 1870-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Rivas, Edelberto Torres
1974 "Poder Nacional y Sociedad Dependiente: Nota sobre las Clases y el Estado en Centroamerica," Paraguayan Review of Sociology, XXIX, Jan Apr:179-210.
- Roberts, Bryan R.
1976 "The Provincial Urban System and the Process of Dependency." in A. Portes & H. Browning,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Urban Research, Austi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Univ. of Texas Press. 99-132.
1978a Cities of Peasants.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78b "Migratio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unpubl.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ESCO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Mexico City.
- Sassen-Koob, Saskia
1980 "Immigrant and Minority Worke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VIII (1):1-34.
1981 "Exporting Capital and Importing Labor: The Role of Caribbean Migration in New York City," Occasional Papers #28, Inter-American Affairs Program, New York Univ.
- Schmukler, Beatriz
1979 "Diversidad de Formas de las Relaciones Capitalistas en la Industria Argentina," in V. Tokman & E. Klein, eds. El Subempleo en Ame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El Cid Editores, 309-51.
- Singer, Paul
1975 "Elementos para una Teoria del Empleo Aplicable a Paises Subdesarrollados," unpub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Employment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La Plate, Argentina.
- Smith, Carol
1981 "What Is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Urban Migration" unpub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New Directions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Research, Duke Univ.,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Tokman, Victor
1978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Informal-Formal Sector Relationships: The Case of Santiago," World Development, VI(9/10): 1187-98.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6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sis," Theory and Society, III: 461-83.
- Wallerstein, I., Martin, William D., & Dickinson, Torry
1982 "Household Structures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Preliminary Theses and Findings," Review, V(3):437-59.

Wolpe, Harold

1975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South African Case," in I. Oxaal, T. Barnett & 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29-252.

